

## 红船精神赋

## 广安学堂里，唱《满江红》的小小少年郎邓小平

本报记者张海磊、李力可

渠江，古人称之为“潜水”，是嘉陵江左岸的最大支流。滚滚江水从大巴山深处而来，途经四川省广安市，又蜿蜒而去，最终汇入长江。

100多年前，15岁的邓小平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后，就是在广安的渠江东门口码头坐船离开家乡的。

在通向码头的望渠巷里，古朴厚重的青石板路两侧，青苔点点，传统的川东民居像一位位倔强的老人卓然挺立。茶馆里，桌子前，三五老人各自泡上一杯茶开始谈天说地。邓小平的故事就这样一次次在茶舍酒肆间被人们讲起。在家乡，邓小平不仅是那个有着雄伟气魄和非凡胆略的革命家、战略家，更是那个立宏志、怀理想又远赴异国探寻真理的少年。

## 开明思想的启蒙

位于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的邓家老院子是一座坐东朝西的传统农家三合院。院前梯田层层，池塘泛绿，树木成荫。17间大小不等的房屋里还原着邓小平祖上三代人在此的生活状态。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他的父亲邓绍昌思想开明，母亲淡氏勤劳善良。此时，邓家已没有往日的光环。

邓家祖上曾是广安的望族。距离邓家老院子不远处是邓小平先祖、清乾隆年间翰林邓时敏的居所。邓时敏是邓氏家族的杰出人物之一，他官至大理寺正卿、通奉大夫，功高德重。没有子嗣的邓时敏去世后，为了给邓氏家族培养光宗耀祖的人才，族中公议，将翰林院子改为学馆。

邓小平父亲邓绍昌曾在成都法政学校读书，接受过新式教育。早年间参加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曾在广安协兴场的“哥老会”中当过“三爷”，后来升为“掌旗大爷”，也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他在邓小平的童年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地群众中至今流传着邓绍昌知道自己误解邓小平“偷”5块大洋给同学妹妹治病的事情后，承认“失察”并称赞儿子富有同情心和责任心的故事。

接触到先进思想的邓绍昌毫无保留地支持着邓小平的学业。翰林院子是童年邓小平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1909年，五岁的他进入这里接受私塾启蒙教育，并在这遇到了人称“邓三先生”的邓俊德。

今年80岁的广安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蔡世武从20世纪70年代起，便通过走访邓小平同学、亲友等方式，收集邓小平在广安时期的求学、生活经历。“‘邓三先生’是个无心科举的落地举子，对清政府统治极为不满。他不仅教经典，也教了很多爱国故事。”蔡世武介绍。

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邓小平熟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私塾先生讲述的“花木兰代父从军”“岳飞精忠报国”等故事更是诱发了他的学习兴趣和对古代英雄人物的崇敬。

## 新式教育的探索

清末民初，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1899年，进步人士在广安城北紫金山上创办了紫金精舍，开广安新学之先河。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张澜曾在此任教。北山小学堂也乘势而兴，它的创办打破了传统教育陈规，点燃了协兴新式教育的火苗。

和邓小平故居络绎不绝的游客带来的热闹喧嚣相比，约4里路之外的协兴老街显得寂静许多。除了街头杂食店门口坐满了打牌、闲聊的老人外，街里的时光如凝固一般。不少老房子大门紧闭，早已无人居住。北山小学堂就在这条老街上。1910年，6岁的邓小平开始在这里接受新式教育。

1911年保路运动爆发，四川各地纷纷响应。蔡世武考证，当时在北山小学堂墙上、柱子上贴满“反对出卖川汉铁路”“打到卖国贼”的标语，老师会向同学们讲述保路运动的情况。课后老师、同学们则会一起走上街头，高唱《来日大难歌》，并抄写标语贴在协兴场各处。巧合的是，当时‘邓三先生’也成了北山小学



广安中学里的邓小平雕像。本报记者王曦摄

堂的国文老师，据邓小平的同学回忆，他还把当时民主革命人士邹容的代表作《革命军》选进了课本。”蔡世武说。

1915年夏，邓小平从北山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学校旧址在如今的广安区区政府院内，是一座二层建筑，悬山式屋顶，白墙青瓦。

邓小平故里管理局原局长马福从事邓小平研究数十年，在他的考证中，邓小平从小便善于用科学精神与封建迷信思想作斗争。据马福考证，在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时，邓小平的同学李再标的母亲得了重病，他决定割肝救母，以尽孝道。邓小平听说后，连忙劝阻：“难道你割了肝，你母亲的病就好了吗？你要相信科学，赶快回去请医生，照顾母亲。”

1919年2月游杭州西湖时，面对岳飞手书的《满江红》，邓小平无限感慨地对陪游人员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学习这首歌曲时的少年邓小平，正处于人生的关键转折点上。

1918年到1919年，邓小平就读于广安中学。这是广安最早的一所正规中学，开设地理、体操、英文等课程。五

四运动后，广安中学的学生成立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邓小平也和一些热血青年一起走上街头，声援五四，抵制日货。

“重庆与广安地理位置相近且有水路相通，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在重庆学生群体中传得很广，邓小平也接触到了先进的思想，1919年广安县立中学组织的示威游行和罢课中，参加者手拿写着‘保山东主权’‘诛国贼’‘还我青岛’‘誓雪国耻’的白旗，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抵制日货。在这些活动中，邓小平都是积极参与者。这些经历都加深了他的爱国情怀，也更加坚定了他的救国信念。”蔡世武说道。

1919年夏，邓绍昌将重庆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带回了老家，希望儿子能够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前往法国学习。邓小平在1919年的秋天与堂叔邓绍圣、同乡胡伦，踏上了县城东门口码头的货船，前往重庆，开始了留学之路。邓垦（邓小平之弟）曾对我说：“留学法国，协兴去了三个人，我父亲功不可没”，由此可见，邓绍昌的思想之开放，对下一代的影响之深远。”马福说。

如今，华蓥山麓，渠江之畔，广安中学的校园里矗立着一座邓小平雕塑，百年荣光注定成为莘莘学子的共同记忆。

## 红色故里的回响

邓小平故居旁是陈列馆，这是一座融合了川东民居风格和现代建筑风格的建筑。陈列馆内，一件件实物、一篇篇手稿、一幅幅图片，形象地展示了邓小平光辉的一生。

离开家乡的邓小平从未回过广安，但他与家乡的连接时常被家乡人提起。

陈列馆里，有一份创刊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来到巴黎后不久，青年邓小平便成为这个刊物的编辑，还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文章，并把刊物寄回家，将革命的火种传播给万里之外的兄弟姐妹。

如今，红色是广安的底色，那段百年的奋斗史时常在这里回响。“铜像广场三面山脊环绕，形似一把天然大座椅，邓小平铜像就端坐于这片绿草茵茵、古树参天的自然环境之中……”近日，广安市广安区东方小学的杨颖同学通过视频的形式，带领大家打卡红色景点，讲述党史故事的广安篇章，这样的接力打卡将由100名中小学生共同完成。除了以中小学的视角走进邓小平故里景区外，学生们还在华蓥山“重走游击队小道”，激发爱国情报志国，“邓小平由一个天真活泼的广安少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员战士，他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他的诺言。通过总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品质和建党一百年来的优良作风，我们更应该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马福感慨到。

绿树夹道，满目翠绿。邓小平故里景区内，来自各地的中小学生正追随伟人足迹，完成着他们的红色主题研学之路。

## 那517名红军西路军烈士遗骸，背后有着怎样的悲壮

本报记者李宁、张子琪、李劲峰

凤凰山下，南川河畔，一处圆拱形的花岗岩大墓静穆屹立。墓旁摆满鲜花，寄托着青海各地干部群众的悼念、追思。

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两万余名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肩负使命、渡过黄河、披坚执锐、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数千名西路军将士中，517名英烈就安葬在西宁红军墓。

## 新中国成立后集中安葬于此

进入烈士陵园，拾级而上走向红军墓，最先见到一座高10.1米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这是朱德同志1958年在青海视察时，特意为西宁市烈士陵园题写的，饱含着这位红军总司令对西路军将士以及英勇牺牲烈士的浓浓深情。

“红军墓中的517位烈士，都是在西宁各地遇难的西路军将士。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集中安葬于此。”西宁市烈士陵园主任刘艳宏说，1955年，西宁市各族群众从杨家台、苦水沟等地，从反动军阀残害红军将士的“万人坑”中，挖出了一具具骸骨，集中埋葬和修建红军墓，让英雄安息、让后人铭记。

1936年10月，刚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属第三十军、九军、五军、骑兵师、教导团等两万余名将士，奉命在甘肃靖远地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一十七路军，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没有根本改变，继续逼迫部队“剿共”。

由于战略局势变化，宁夏战役计划中止，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炮火连天响大地，我们红色的战士，英勇的武装，上前线，决战在今朝！”在空旷的西北原野上，北风呼号、飞沙扑面、呵气成冰，西路军将士们开启艰苦卓绝、血火交织的漫漫西征。

巍巍峨峨祁连山，风刀血剑裂骨寒。由于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西征不幸失利。从1936年10月下旬至1937年4月间，在历经70余次大小战斗、歼敌

2.5万余人的情况下，西路军阵亡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其中部分被俘战士经由祁连山脉，被转押至西宁、循化等地。

据有关部门查证，西路军被俘将士共有3000多人囚禁在青海各厂矿、煤窑、医院、剧团等处服苦役。其中“新二军补充团”是规模最大的集中营。反动军阀马家军勒令他们在西宁修桥、盖房。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被俘西路军战士每天要干10多个小时繁重的体力活，终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修桥的西路军战士被强迫到刺骨的河水中打桥基、搬石头，浑身冻得发紫；盖房的西路军战士要到十几里外的地方搬运木料、石头、砖瓦，全凭肩扛人抬，累得筋疲力尽，没有喘息之机，即使大雨滂沱，身患疾病，也不允许休息。

忠骨英魂，万古千秋。大量西路军战士遭到马家军惨无人道的迫害。据统计，1600多名西路军战士在西宁惨遭杀害。

“西征虽然失败，但西路军却在广大西北地区播下革命的种子，在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西路军纪念馆馆长孙孟桥说，西路军将士在河西浴血战斗，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他们崇高的革命理想和舍生忘死的英雄精神，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史上。

## “留胡节不辱”

他们浴血奋战，不屈不挠。

1937年3月，经历河西走廊失利后，身受重伤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率领近百位西路军战士走进了风雪茫茫的祁连山。

祁连山峦积雪未消，裸露的岩石阴森可怕，空气凛冽而干燥。在祁连山草岭大坂的大山根石崖边，熊厚发率领的部队同马家军的搜山部队不幸遭遇。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熊厚发没有屈服，坚持战斗。

经过浴血奋战，西路军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熊厚发腿部负重伤，被敌人包围。敌人迫令熊厚发投降，当即遭到他的怒斥痛骂。

残暴凶狠的敌人恼羞成怒，将年仅23岁的熊厚发杀害于青海祁连县黄藏寺附近。壮烈牺牲时，这位年轻优秀的师长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



3月30日，市民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内参观。本报记者张龙摄

国工农红军万岁！”

他们彼此鼓励，坚定信念。

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瑞龙等八位西路军指战员不幸被俘，被关押在监狱中。为了狱中坚持同敌人斗争，他们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当他们被押解到西宁后，党支部商议决定以“坚定思想、稳定内部”为任务，相约决不暴露自己原来的姓名和身份。

在每天放风时间，党支部的成员便聚在一起，用手指、树枝在地上划下“坚定”二字互勉；还常常一同吟唱《苏武牧羊》、《留胡节不辱》、“大节不稍亏”、“历尽艰难，心如铁石坚”等歌词相互激励。直至被解救出狱，党支部成员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

他们巧妙施计，帮助战友。

西路军失利后，曾庆良、黄良诚、刘玉庭等6位熟悉电报工作的西路军战士被俘。因马家军缺少报务人员，他们被派往马家军电讯台工作。

1937年4月间，马家军得知西路军一支部队正在向祁连山突进的消息，便电令在甘肃梨园口驻扎的部队昼夜追击，企图包围歼灭。当天，刚好是曾庆良替马家军报务员值班。得知电报内容后，他与黄良诚商量，果断决定冒着生命危险扣发此封电报。“就是赌上性命，也绝不能让电报发出去。”

而后马家军追问起前方消息，却发现这封关键的电报并未发出。敌人觉察不对，便恶狠狠地质问他们，曾庆良平静

地回答：“天气不好，干扰太大，声音嘈杂，发不出去。”

正是这封“十万火急”电报的扣发，不仅延缓了马家军对西路军突击部队的围剿追击，也为这支最终抵达新疆的西路军左支队的顺利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为革命保留了珍贵火种。

孙孟桥介绍，西路军将士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和环境下，表现出的视死如归、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永为后人纪念。

## 各族群众助力脱险

在西路军纪念馆内，一幅幅版画、一座座雕塑，讲述着青海各族群众冒险营救、掩护、帮助西路军将士的经历。

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在高台战役中被敌人连砍数刀，头部重伤昏迷后被俘。在押解前往西宁的途中宿营时，吕仁礼寻机逃离虎口。在深山野谷中走了两天后，饥寒交迫，伤口剧痛的他，昏倒在地。

此时，凶恶的马家军在甘肃、青海等地疯狂搜捕、屠杀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使整个河东、河西地区都笼罩在恐怖之中。

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50多岁老人家中。原来老人家在野外遇到了昏迷的吕仁礼，将他背回家中。见到吕仁礼苏醒，老人家从炕洞里掏出几个热土豆给他充饥，又换下他身上的

血衣。离别时，老人家再三嘱咐：“你往山上走，别往川里走，碰上马家军就没命了。”

沿着山路，吕仁礼翻山越岭，体力不支时遇到一位60多岁的藏族僧人。这位僧人不仅给他送饭，还照料他治病。休养了一个多月，归心切的吕仁礼告别老人，再次踏上寻找部队的路途。当他来到甘青交界的大通河时，发现驻守的马家军正在对过往人群进行严密盘查。

正当吕仁礼一筹莫展、焦虑万分之时，他找到一位40多岁土族老乡介绍了他的经历。这位土族老乡说：“不要紧，你当我的儿子，装哑巴别开口，他们问话由我出面。”如此帮助吕仁礼平安渡河。吕仁礼后来回忆说，正是汉族、藏族、土族群众的冒险帮助，才让他实现顺利归队的愿望。

此时，党中央也在沟通各方渠道，全力以赴营救西路军将士。西路军纪念馆副馆长陈革介绍，据统计，从1937年5月至1938年8月期间，经多方营救和不懈努力，共有4000多名西路军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脱离险境，回到革命队伍和党的怀抱。

逝者悲壮，生者顽强。青海高原地广人稀，部分西路军战士走散后，一直无法与部队取得联系，却始终坚守信念，等待归队。

红三十军副军长廖永和战斗中右腿负伤，在一次急行军中掉队。从此，他开始了在柴达木盆地12年漂泊的艰苦岁月。

在艰难向西追赶部队的过程中，他和其他掉队西路军战士组成新的战斗集体，彼此搀扶。途中遭到土匪、廖永和在战斗中再次负伤。为不拖累战友，他和另一名小红军留下来，躲在岩穴中。此后，他们流落至当地部落，参与放牧。

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廖永和在距离西宁400多公里的德令哈得知消息后，找到帮人赶骆驼的机会，走了18天终于在西宁湟中找到党组织。几经核实情况，加上廖永和表现积极、立场坚定，第二年组织吸收他重新入党。

此后，廖永和先后担任青海都兰县委书记等职务，在昔日贫穷落后的草原，带领群众建设出社会主义新农村。